

修缮之前先考古，长城保护有了新范式

本报记者张米扬、薛园

在以雄奇险峻著称的北京怀柔箭扣长城上，一支考古队正在细致地挖掘。根据一块新出土的石碑文落款“万历十二年”，箭扣长城有考古依据的修建时间又提前了33年。

今年6月，距离箭扣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北京延庆大庄科长城，该考古团队就发布了一批成果——深埋地下的城墙、守城士兵“野外烧烤”后的碳化物，以及火器弹丸、剑柄、杯碗碎片……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去年批复了上述两段长城的研究性修缮项目。在修缮中首次引入考古环节，是这两个项目不同以往的显著“亮点”，长城保护由此开启新阶段：由注重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研究性、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注重文化生态、遗产地环境的整体保护转变。

修缮之前先考古

北京市延庆区东南沿界，山崖峻绝，层峦叠翠，始建于明初的大庄科长城就横亘在山脊之上。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探访考古现场时，考古工作者正在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下，专心致志地“土里找土”。

“一块瓷片！”现场一阵兴奋。

项目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尚珩接过瓷片端详，“看弧度应该是瓷碗的碎片，是明朝官兵在这里驻扎时使用的。”尚珩判断，“而且这个碗还被修补过，有打铜子的痕迹，说明当时士兵们的生活比较清苦，即使碗破了，修补后还要接着使用。”

生活用品是长城考古三大类别之一，和武器类文物一起见证了古人在长城上的活动痕迹。第三类别则是“建筑构件”，还原长城从营造、废弃到部分坍塌的动态过程。

大庄科长城西侧4号敌楼的窗户保存完整，拱券砖石无一缺失，但窗户外沿距地面仅1米多，窗外还有一块约1米见方、估算重达1吨的巨石。战时这样的高度如何御敌？这块明显不属于长城的巨石又是从何而来？

考古人员认为，现有窗户距地高度绝不是长城正常使用阶段的高度。通过在旁侧大量下挖作业，深埋地下5米有余的城墙重见天日，证实了考古人员的判断；至于这块巨石，考古人员推断，极有可能是长城废弃多年后，因为某次大雨，从紧挨着长城敌楼的山上滚落下来的。

考古、设计和施工三方多次会商，决定只挖出敌楼边侧城墙，对于窗外的巨石，则不再挖掘。

“坍塌物本身也是长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次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一般考古规程，即继续挖掘后期堆积的部分，露出原始地面，再将渣土清理掉，而是在多次讨论后决定将坍塌物整体保留下来，再通过土层横截面和巨石，展示此处的时空顺序、演变轨迹和历史场景，这是最生动的长城故事之一。”尚珩这样解释。

事实上，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了长城的现存状态：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并具有突出的文化景观特征。

古建筑好比故宫，古遗址好比圆明园。



六月九日，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考古负责人尚珩（右三）向媒体记者介绍延庆四号敌台的考古成果。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如果把长城当作一个古建筑去做修缮，那么就需要恢复到它最辉煌的建筑形式时期，这并没有必要。”尚珩说。

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设计师赵鹏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修缮长城的重点不是把本体修得多么坚固，而是把文物的价值点更好地保留下来、展示出来。

尽管理念层面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一到具体修缮过程中，更多是项目负责人各凭经验。即使是最基础的问题，如勾缝材料到底用白灰还是水泥，需不需要加糯米浆，工艺技巧上采用平面勾缝还是养麦梭等，都尚未达成一致。更有甚者，因在修缮中出现“盗窃砖瓦维修”“粗放式施工”等乱象，引发过争议。

这种各自为战、未能高度协同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长城的高质量保护。“如果通过前期考古对该段长城有了充分了解，修缮方案的设计和执行为首当其冲的‘指导手册’，更有针对性，也会减少返工的次数。”这是参与项目专家们的一致看法。

以大庄科长城4号敌楼城墙墙体挖掘为例，考古人员发现，这一处城墙的建筑形制与原本设想并不相同，并非直接从地面开始垒基石，而是先做了基槽，这样才能保证建筑更稳固稳定。这一考古发现，为后期修复提供了重要参考。

长城保护新阶段

2019年10月，纪录片《长城抢险》的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抢险”成为彼时长城保护的新模式；差不多一年之后，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箭扣长城脚下挂牌成立；2021年，以基地挂牌成立为契机，北京市文物局听取专家建议，选取延庆大庄科长城和怀柔箭扣长城为首批试点，上报有关部门开展研究性修缮项目探索，“是一种遗产保护理念在保护实践中的探索”。

“抢险”说到底还是临时性的，不是长久之计，后续依旧面临维修，而且由于时效上的要求，较难关注到细节，因而我们

还是需要对于长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探讨。”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负责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表示，“另一方面，北京长城抢险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对于一些问题的存在也到了阶段性总结和回馈的时候。”

与以往修缮过程中各专业技术人员作业相对分离不同，研究性修缮从工程启动便形成协同模式——以考古挖掘为开端，多学科研究为手段，数字化跟踪记录为保障，考古、设计、勘察、施工等人员在各环节协同配合，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根据多年经验，前期我们就做好了评估和框架图，确定研究主要涉及长城本体、长城病害及长城赋存环境等三个方面，现场工作时考古、测绘、结构、材料、植物等学科都有专业的研究团队，设计和施工也是紧密结合，全程参与。”汤羽扬介绍。

在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中，关于墙体顶面植物的处理方式分歧已久。部分学者认为，植物生长是对长城结构主体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应以清除；也有学者认为，作为遗址型文化景观及景观，长城上的植物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同样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适当保留。

基于这样的长期讨论，在本次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中，项目吸纳了景观植物学研究团队参加，对长城墙体顶面现状植物展开调查研究和定量化评价，为后续选择性清理技术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长城保护的典型案例，北京司马台长城的成功修复，公认与前期严格缜密的勘察设计息息相关。收录了该项目大部分修复工程文件的《司马台长城》一书，迄今为止仍是经典的长城保护工程资料。

“过程性材料既是对当前工作的总结思考，也是给予后人的借鉴参考。”尚珩说，正因如此，此次研究性修缮过程中所有参与的学科及数据、工程图纸、方案

设计等，都会在项目结束后汇总集结，形成全套完整的工程资料，并面向社会出版。

仍需社会力量接力

汤羽扬认为，此次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之所以能顺利推进，与参与其中的专家、社会基金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情怀有很大关系。

北京市文物局已确认，会把长城的研究性修缮项目滚动进行下去，为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累更多经验，也为全国长城的修缮保护提供借鉴。

这也带来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总长度超2万公里，横贯15个省份的长城，是世界上现存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再加上较多的历史欠债，仅凭地方政府和财政资金扶持难以实现长城的保护和修缮，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和普通公众的参与。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多年的实践中发现，即使有拍摄纪录片、出版绘本、制作相关小程序等一系列工作，由于长城知识体系的庞杂，公众对长城的了解依旧不算深入，急需更多生动活泼的手段，让长城知识“不再晦涩难懂”，这也是其近些年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助力长城保护的主要目的所在。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表示，数字文博传播范围的广泛，能够让人们更好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内涵，体会文物所承载的中华灿烂文明和民族精神，增强个体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自觉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

“对一个国家而言，透过文物不仅可以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还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华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之路。这也是长城保护乃至所有文物保护对于国家和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刘玉珠说。

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记者陆敏)74岁的林子祥说，没想到，到这个年纪还能有新的歌迷；60岁的叶倩文说，感谢这个节目把港乐老歌做成了“新鲜的生命”。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音乐献礼节目《声生不息·港乐季》，通过内地与香港歌手共同唱响港乐金曲，用音乐对话，广受好评。节目将最高荣誉“荣耀人物”大奖颁给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而他们泪洒现场的情景也感动了观众。

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亲历香港流行乐坛的高峰和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他们在歌唱中见证时代，演绎传奇，也用歌声连接香港和内地，凝聚人心。

经典港乐 承载记忆

并肩坐在记者面前的林子祥和叶倩文，一个低调寡言，一个优雅大气，两人不时相视而笑，顾盼间神采依然。夫妻俩一人一头银发，证明岁月如梭。

林子祥学生时代就组建乐队，上世纪70年代发行了第一张专辑，1981年就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他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代表作有《敢爱敢做》《男儿当自强》《真的汉子》等。

叶倩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横扫香港各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她的《潇洒走一回》《祝福》《情人知己》等金曲火遍大江南北。

2022年的夏天，因为港乐，多年来已半退隐的林子祥和叶倩文重回大众视野。“这是缘分。”叶倩文说。

第一次登台，林子祥一件灰色外套，叶倩文一袭红裙。一开口便知“王者归来”，声音里依然有挡不住的光芒。

在林子祥的歌声中，随处可见“迎入日月万里风，笑揖清风洗我狂”“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这样的豪迈歌词。他用高亢有力的演唱功力，将中国风范和侠义美学演绎得豪气干云，充满大爱。

在节目歌曲《水中花》演唱前，一首粤语朗诵的宋词令人惊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林子祥第一次朗诵古典诗词，但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我小时候爱看武侠电影，听电影里的歌。”林子祥说，“香港流行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港乐金曲里，有“狮子山下”的奋发向上，有“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家国情怀，有“沧海一声笑”的潇洒气度，有“男儿当自强”的坚韧不屈……这些积淀着中华文化底蕴的歌曲构筑了港乐的精神框架，成就了传奇，也承载了中国人关于港乐的集体记忆。

同频共振

同唱一首歌

“永远的经典！”“热泪盈眶”“用生命在歌唱”“这才是真

林子祥和叶倩文：岁月如歌 且行且唱

正的中国文化！”……弹幕上网友的评论雪片般涌来。在每次现场演出结束时，全场大合唱《海阔天空》《红日》《东方之珠》等金曲的场景让他们感动。

“身处现场，那种感觉很难忘。”林子祥说，过去即便开演唱会，也不过一两个歌手跟大家互动，而节目现场却是所有的歌手和所有的观众同唱不止一首歌，每首歌都感动。

最后一场演出，全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随着音乐歌唱和挥手，气氛到达了高潮。“我想握住每个人的手。”叶倩文说。

“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在台上哭过。突然觉得这几个月的感情通通要从心里往外爆发出来，想忍也忍不住，真的是太感动。现场感觉是非常温暖甚至炽热，我整个人是热的。”叶倩文说，连感情极少外露的林子祥也忍不住当众拭泪。

这一刻，音乐将爱传递，把心紧紧相连。

“音乐没有界限，我不觉得内地跟香港有什么区别。距离那么近，过个关就到了，何况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叶倩文说，“我们不在意唱的是粤语歌还是普通话歌，讲什么方言不重要，重要的是歌让人共情共鸣。”

节目播出后，林子祥和叶倩文有了一大批新歌迷，很多是年轻人。歌迷们他们写很长的信说为什么喜欢他们的歌，又如何被他们的歌影响和激励。林子祥深信音乐的力量：“我不爱说话，感谢有音乐，我想说的都在歌里了。”

文化互通 激发新能量

这是夫妻俩从艺几十年来首度同时参加一个长达四个月的节目。他们见识了内地演艺制作的专业与敬业。“节奏快得不得了，每一集都是新的体验。”叶倩文说，内地歌手让他们刮目相看，“很多歌手都非常厉害，大有天分了”。

在节目中，新生代歌手用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老歌注入新元素，既保留了原本的韵味，又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林子祥与新生代歌手合作演绎的《真的汉子》，对老歌重新编曲，演唱部分还吸收了川江号子的元素，听来更为震撼；邓丽君的经典金曲《忘记他》增加了说唱和京剧唱腔，别有韵味；劝勉孩子努力读书的粤语歌《学生哥》与普通话歌曲《读书郎》混搭，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优秀的创作也激发了他们的音乐新能量。他们重新演绎的《敢爱敢做》深受观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版本，我们也很开心。”叶倩文说，这是把老歌做成了“新鲜的生命”，“让好歌可以走得更远，陪伴更多的人”。

岁月如歌，这对乐坛“神仙伴侣”一路唱着走过。“唱歌是我们的福气，只要还有人想听，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叶倩文说着望向身边的林子祥，他含笑点头。



▲8月4日，林子祥(右)和叶倩文接受新华社记者吕小焜采访。

北京大运河考古的新发现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罗鑫)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北部，经过考古发掘和保护，考古工作人员正在揭开一座古城的神秘面纱。

这座平面呈近似方形的古代城市遗址，以两汉时期为主体年代，在北京地区考古历史上实现了多个“首次”。“在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及其周边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出一定数量的东汉时期的木、竹筒牍，这在北京市地区汉代遗址考古中属于首次发现。”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说。

在此间举行的2022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上，陈名杰介绍，大运河北京段文化带建设成果丰硕，大运河考古再获新发现。2021年以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在大运河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开展考古发掘项目102项，发掘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据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属渔阳郡；东汉改“路”为“潞”，始称潞县。路县故城遗址就是两汉时期潞(潞)县的治所。

对筒牍上的文字信息进行解读，信息内容值得期待。

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工作站，植物种子在经过高倍数显微镜放大后，投射到与显微镜相连的电脑显示屏上，种子上的纹路清晰可见。

“路县故城城郊遗址的灰坑、水井等遗迹中发现了水稻，结合路县故城遗址多处地点水稻的出土情况、文献记载以及测年结果，我们推断最晚至东汉初年本地区已经进行水稻种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部工作人员尹达说，“但两汉时期水稻的出土概率都较低，说明对水稻的接受程度及稻作规模有限。”

今年3月12日至4月18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水系(镜河北段)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在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内的东南部清理了一处西汉时期制陶遗址。孙勳介绍，两汉时期的冶铸遗址区、西汉时期的制陶遗址区等手工作坊遗址区的发现，对确定城郊遗址的性质、功能非常重要。

孙勳表示，近年来的路县故城遗址

考古，首次明确了北京地区汉代城市手工业遗存的遗迹组合，也是北京地区两汉时期手工业遗存的首次大规模发现。陶窑、炼炉与水井、房址、灰坑、道路等遗迹的空间分布和功能组合，为了解、复原路县故城遗址的制陶、冶铸等手工业生产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通州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清理古代墓葬1146座，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套)，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通过近年来的全面勘探，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基本推断出路县故城城址的位置、形制、规模、功能等。出土的包括陶器、铜器、玉石器等在内的千余件不同种类的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器以及大量动物、植物遗存等，为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具体状况提供了契机。”孙勳说。

据介绍，路县故城遗址区内已发掘出带有战国、西汉时期陶文的各类器物

70余件，是北京地区出土陶文物最多的遗址。出土的木篋、木梳、木桶、木盘以及铲、耙工具的木柄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汉代木制实用器皿，是了解当时人们具体生产、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去年，经前期勘探，在路县故城南城段发现一处豁口，并探明豁口部分叠压有不同时期的道路，可能为门道，据此推断此处为路县故城的南城门遗迹。”孙勳说，城门是城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路县故城南城门遗迹的发现，为探寻城址内、外遗迹分布与构成提供重要参照，也为日后向公众展示提供了契机。

2017年，北京市决定对路县故城城址进行原址保护，建立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路县故城城址成为北京地区首个以汉代城址为主体建立的遗址公园，也是北京地区首个在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中完整保护下来并建立遗址公园的大遗址。

“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顺利完成，正在开展二期绿化工程；路县故城保护展示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3年6月完工，2024年实现开馆。”陈名杰说。